

音乐活动:人以美的音响符号进行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

黄汉华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音乐活动是作曲家、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在音乐创作环节中,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的自我交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式;在音乐欣赏环节中,则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心灵—精神的双重交往。

关键词:音乐活动;音响符号;情感交往;对话

中图分类号: J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2007)05-0064-06

—

音乐活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音乐产品(商品)的生产、流通(传播)、交换所进行的物质、精神交往的社会活动过程。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看,它是作曲家主体通过特定音乐审美符号(作品)的创造使内在情感对象化的一种精神的自我观照和自我交往,并且以特定音乐审美符号(作品)为中介通过音乐实践环节与他人(演绎者、欣赏者)所进行的主体间的精神交往的过程。曾遂今的《音乐社会学概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社会学角度研究音乐交往的专著,作者对我国当代社会音乐的生产、传播、社会群体的划分等问题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探讨,使当代中国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的模式和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揭示。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音乐交往的基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音乐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音乐交往与从音乐美学角度去研究音乐交往,其侧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音乐社会学更多地是从外在的方面去探讨音乐产品(商品)得以生产(创作、制作)、流通(传播)、交换的社会机制;而音乐美学则更多地是从内在的精神层面上去探讨审美主体间如何通过特定的音乐审美符号(作品)的创造,并且以特定的音乐审美符号(作品)为中介、如何通过

收稿日期: 2007-02-1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6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音乐符号意义之研究”(批准号: 06GR-01)

作者简介: 黄汉华(1956-)男,广东大埔人,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

演绎、欣赏的环节而实现彼此间的精神交往的过程。它涉及到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主体间性、符号中介、交往方式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展音乐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音乐审美活动的本质、方式和特征的认识。然而,迄今,我国音乐学界对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展开较深入的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音乐交往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二

什么是音乐活动的本质?在笔者看来,音乐活动的本质是人们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并且通过美的音响符号形式为中介,传达、交流情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活动。从精神生产(消费)的角度看,音乐家的创造活动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媒介——声音,构筑出一个能给观赏者听觉感官带来美感的、能满足观赏者精神需要的、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音乐艺术品;从精神交往的角度看,作为美的有意味的音响符号形式的音乐艺术品,一方面是音乐家把自己心里曾经体验过的情感通过音响符号形式对象化,是音乐家自我情感的一种表达,自我观照,自我对话;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表达又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同时也是音乐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的情感表达,也就是说,音乐家的“小我”情感实质上是 he 所属时代和群体的“大我”情感的一种折射。因此,作为音乐家情感的对象化的艺术品所表达的情感是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鸣的社会性情感。音乐家之所以成为音乐家是能够把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却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的感情用美的有意味的音响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家成为大众社会情感表达的代言人,而音乐艺术品则成为大众社会情感表达的符号象征,成为在社会中传递和传播感情的一种手段,它的直接作用就在于促进情感的社会化。音乐艺术审美活动由此成为音乐家与社会大众情感交往和互动的过程,成为音乐家与社会大众主体间的情感交互和对话的过程。

1. 音乐创作:作曲家主体情感的自我交往

作为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者——作曲家,其创作目的:一方面是,作曲家通过创作为人们构筑出一个能给人的听觉带来愉悦感的符合美的规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音响物;另一方面是,作曲家希望通过美的“有意味的形式”的音响物,传达作曲家主体内在生命情态的体验,在心灵—精神层面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在音乐审美交往活动中,以乐谱符号凝定的音乐文本是作曲家把内在生命情态体验转换为内心音响想象,并通过内心的音响构筑,借助乐谱符号的书面化,使之对象化为一个非音响的符号物的行为过程。通过乐谱符号文本,不可观照的心灵书面化为一种可供观照的心灵,不可观照的内心音响书面化为一种可供观照的乐谱符号文本。换言之,乐谱符号文本的实现是作曲家主体的本我外化为他我,内心音响外化为乐谱符号文本的过程。柴可夫斯基在创作经验时曾这样说道:“在我的交响曲(指《第四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乐句不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的;其中每一个音符都是我性格的最真挚的部分的回声。”“昨天早晨我写好了歌剧(指《黑桃皇后》)的实际上的结尾,当我写格尔曼之死和最后的合唱时,我突然为对格尔曼的怜悯心所征服,竟至哭泣起来……现在我相信我对歌剧主角的温暖的、活生生的感情也亲切地反映在音乐中。”^[1]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本成为独立于作曲家主体之外,然而又作为作曲家情感的象征物的客体而存在着,当作曲家阅读自己创造的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本,或者在聆听自己创造的音响化的符号文本时,实质上是作曲家与他所创造的情感对象化的符号(乐谱的、音响的)文

本之间进行的一种精神自我交往,这种交往既内在于作曲家主体亦外在于作曲家主体,是作曲家主体的本我与他我的心灵—精神的自我对话。

2 音乐演绎:演绎者与作曲家之间的情感交往

音乐表述是为他人而建构的,每一个音乐表述都以音乐交际领域而与其他人相联系,并充满他人的回声和余音。音乐表述的开始是对他人表述的应答,在轮番一轮的应答和期望中音乐表述充满的是音乐对话的泛音,音乐对话的张力存在于整个音乐表述之中,支配着整个音乐对话,即使是音乐独白,只要它期待着应答,那么,它就是在对他人而言说,就在期待着应答,因而也就参与了思想交流过程。音乐音响符号的创造行为只是音乐审美交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作曲家的创作目的不仅仅停留在主体心灵—精神自我对话的层面上,它需要进一步对外扩张,在更大范围内与他人进行心灵—精神层面上的对话和交往。

巴赫金认为,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接壤处。“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2]巴赫金的“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主体间性”,关于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纯粹的主体间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的对称关系决定的。”^[3]我的存在是一个“我之自我”,我以外皆为他者,自我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在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因为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就如同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但是,这个盲区却可以被他者所看见,这种独特的个体视野即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完结、自给自足的,自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除了自我内省外,还需要借助他人的外位超视,从他人对我的感受中感受到自我在人群中的存在状态。由于世界是主体间性的世界,对话也是人与人交往的确证,因而对话本身便暗含着一种双声现象,既反映自我的话语指向同时也反映他人的话语指向。因此,作为作曲家心灵—精神象征的乐谱符号文本便成为作曲家与他人心灵—精神进一步交往的重要中介形式。此外,书面化的乐谱符号文本并非音乐文本的最终实现形式,只有把非音响符号文本转化为音响符号文本,音乐文本才算最终完成。音乐文本的非音响向音响的转化,这需要通过作为他人的演绎者的演绎行为(奏、唱)的介入才能实现。这种转化实质上是演绎者(指挥家、演奏家、演唱家)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过程。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交往方式,一般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演绎者作品的演奏与作曲家发生心灵—精神上直接交往。音乐史上,有不少伟大作曲家,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等,在世时都曾亲自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在这种演奏中,一方面,作曲家可以把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作为创作主体的内在生命情感的体验,以及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作为作曲家真正想要达到的实际音响文本等向演绎者进行阐释;一方面,演绎者可以把自身对乐谱符号文本所蕴涵的生命情感意义的独特体验以及对乐谱符号文本转化为音响符号文本的独特理解,与作曲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使演绎者演奏的音响文本更逼近作曲家的心灵—精神层面,也更逼近作曲家心目中的音响范本。如果从以文本为中心的古典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处于这种交往方式的演绎活动,应该说是比较理想完美的演绎活动。然而,这种交往方式是有前提条件的,它要受交往主体双方历史时间维度的限制,也就是说,交往主体双方必须处于同一历史时间维度才有进行直接交往的可能,失去了这一前提条件,交往主体双方则无法进行直接交往。在乐谱符号文本的传播过程中,

演绎者与作曲家处于同一历史时间维度的, 毕竟占少数, 大多数的演绎者与作曲家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维度(历史时期)的, 那么, 两者之间的交往只能作为“在场”的演绎者与“不在场”的作曲家的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心灵—精神的间接交往。这种交往则属于第二种。在这种间接交往方式中, 演绎者面对的是一个作为作曲家心灵—精神的象征物的乐谱符号文本, 这个乐谱符号文本以无言沉默的方式呈现在演绎者面前, 它需要演绎者的阅读和演绎行为的开启, 才能向演绎者显现自身蕴涵的意义并与演绎者进行对话。对于作曲家来说, 乐谱是他与演绎者进行对话交流的主要中介, 他通过乐谱符号表达他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 把演绎者的演奏行为规范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 使演绎者演绎的音响尽可能符合自己意欲表达的音响。对于演绎者来说, 乐谱是他与作曲家进行对话交流的主要桥梁, 因此, 演绎者一方面通过对乐谱的仔细解读, 希望尽可能地理解和接近作曲家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 乐谱符号成为他再现作曲家意欲表达的音响形态的重要依据, 它规定着演绎者对每个音符和每个演奏动作的处理, 使演绎者的演绎音响和演绎行为处在一个有序的形式规定之中。演绎者的任务就是在通过他对乐谱的解读和演奏把被过滤掉了的丰富、生动、感性的音响形态尽可能地再现出来。另一方面, 演绎者通过阅读作曲家的生平传记、创作手记、书信等等, 从中了解作曲家内心的真实世界, 在精神层面与作曲家交流对话, 在深刻理解作曲家的意图的基础上, 才能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融合到作品中去, 在作品允许的范围内把想象力发挥到最广和最深的程度。著名女钢琴家古伊奥玛尔·诺瓦斯以独特而感人的风格演奏肖邦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当传记作家迪安·艾尔德问她:“你弹奏时, 你主要考虑和追求的是什么?”她说:“啊! 我首先考虑的是遵照谱子的要求, 我尽力按照作曲家所写的去读谱, 考虑作曲家所设想的弹奏效果,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弹钢琴的人都有的责任。”艾尔德问:“你是如何理解肖邦的?”她答:“我读肖邦的传记, 他太痛苦了, 有时令我边读边痛哭起来。我说‘为什么这个可怜的人因为要使我们得到他的音乐而受这么多苦呢? ……肖邦和舒曼生活里的痛苦使我有许多感触。”由此可见, 真正伟大的演奏家他们的演奏之所以能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 不仅因为他们具有高超娴熟的演奏技巧, 更因为他们能够在精深层面与作曲家交流和对话, 通过他们的演奏把作品中蕴涵的作曲家的精神世界展示给广大听众。

3 音乐欣赏: 欣赏者与演绎者、作曲家之间情感的双重交往

如果说音乐演绎是演绎者与作曲家之间通过乐谱符号这个中介与作曲家进行的情感对话的话, 那么音乐欣赏则是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情感的双重对话。实际上, 欣赏者聆听的音响作品, 其中蕴涵的不仅是作曲家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演绎者的精神世界。这是因为演绎者在演绎作品时, 一方面, 深入到作曲家的心灵精神世界中去, 与作曲家进行“神交”, 把自己融入作曲家精神中, 感作曲家之所感, 想作曲家之所想, 尽一切可能去理解和表现作曲家的意图; 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时代以及生活背景等的差异, 演绎者与作曲家的内心精神世界又不可能是完全合一的, 因此, 演绎者在极力表现作曲家的精神世界的同时, 也把自己的不同于作曲家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融入作品音响中去了。音乐对话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的音乐社会评价, 即人对历史现象、社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 这种音乐的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音乐对话中决定其意义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因为正是音乐的社会评价使得音乐对话的事实上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性, 它决定演绎者对音乐对象、形式的选择, 决定它们在具体的音乐表述内独特的组合, 决定着音乐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音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以擅长弹奏贝多芬钢琴作品的著名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在谈到如何解释处理贝多芬钢琴作品时说过这样一段

话：“尽一切可能去理解作曲家的意图，然后再这个基础上让你的想象力升华和飞跃。解释作品这一概念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方面是服从作曲家的意图；另一方面是解释者的世界观和人格在他对作品的人是中有血有肉地反映出来。这两者必须平衡起来。”他认为：“首先，你必须通过研究早期的版本、手稿和摹本来做到绝对忠实作曲家的原意。……另一方面，这种对作曲家原意的忠实又仅仅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钢琴艺术家建立起他自己的幻觉和他对作品的理解。……随着钢琴艺术家艺术生涯的成熟，他会看见更深的东西，原来的幻觉会变得更为深邃。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总是趋向于从某段作品中揭示出新的意义，这使你越来越接近音乐内在的核心。”经由演绎者演绎的音响作品，其精神内涵已是作曲家和演绎者心灵一精神独特的混合体。欣赏者在聆听、体验、理解由演绎者演绎的音响作品，他不仅在聆听、体验、理解作曲家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在聆听、体验、理解演绎者的精神世界。

在音乐对话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受话对象（听众）因而音乐表达者在表述时，就得考虑受话对象聆听时的情况，如对音乐文本背景的熟悉程度，对音乐文本话题的专门知识，他的观念和信念，他的好恶，他对音乐话语的应答反应，乃至他的社会地位、年龄，等等。表述者对这些情况的考虑，将影响到表述者对音乐表述的体裁、音乐语言手段（表述风格）的选择，只有音乐表述具有针对性，表述才能成其为表述。被誉为当今世界小提琴天后的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为纪念莫扎特诞辰 250 周年，今年 6 月到中国巡演，在广州演出时，记者问：“对莫扎特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她答道：“莫扎特的每一部作品都需要你去用心领会，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上的珍珠那样，每一部作品的每一个音符，都像珍珠那样闪闪发光。莫扎特的每一个音符都很特别，……需要你去关注每一个细节，去深究它。”广州交响乐团团长余其铿认为：“从排练中你可以看到穆特的严谨，作为一个德国演奏家，他对莫扎特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传统和正宗的。”与穆特合作的乐队指挥叶诗咏说：“她确实非常严谨，严谨到对每一个音符的要求，她不肯放过任何她不喜欢的地方。对音乐的理解本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她的理解和诠释。”实际上，穆特是用她作为德国女性音乐家的独特的心灵去感知莫扎特，体验莫扎特，阐释莫扎特的。在她演绎的莫扎特作品的音响中，不仅体现了莫扎特独特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折射了她作为德国女性音乐家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和阐释，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她个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作为听众，之所以能对穆特现场演奏的莫扎特作品产生热烈的应答。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听众对莫扎特音乐作品、风格等较为熟悉，这样他们就能对现场的音乐表述产生积极的应答反应；另一方面，是因为听众通过穆特富于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演奏，生动体验、理解蕴涵在音响中的莫扎特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进而与莫扎特的心灵相遇、相交，同时，通过莫扎特作品演绎这个中介，听众真切地感受到了穆特富于生命力的、活生生的演奏情态（包括她的演奏体态、脸部表情等一切富于生命感染力的细节）从而进一步体察穆特内心深处的独特的精神世界。穆特同样为现场听众的真诚和热情所感动，这种感动更加激发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莫扎特作品的演绎中。听众感受到的莫扎特是由穆特传递给他们的莫扎特，莫扎特的精神世界通过穆特的演奏而生命化了、肉身化了，人们从穆特的演奏情态中透见到了莫扎特的生命情态，从穆特的精神世界中透见到了莫扎特的精神世界。因此，在这种交流中，听众不仅与作曲家莫扎特在心灵一精神上进行对话，而且同时与小提琴演奏家穆特在心灵一精神上进行对话。这种心灵精神的对话是双重性的。

综上所述，音乐活动是作曲家、演奏家和欣赏者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进行的情感交往的特殊方式。在音乐创作环节中，表现为作曲家主体的本我的情感与物化为他我的符号文本的情感

的自我交往；在音乐演绎环节中，表现为演绎者与作曲家以乐谱符号文本为中介的情感交往方式；在音乐欣赏环节中，表现为聆听者通过音响符号这个中介与演绎者和作曲家进行的情感的双重交往。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音乐活动是作曲家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并且通过美的音响符号形式为中介与演奏家、欣赏者进行情感交流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从精神生产（消费）的角度看，作曲家的创造活动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媒介声音构筑出一个能给欣赏者听感官带来美感的、能满足欣赏者精神需要的、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音乐作品；从精神交往的角度看，作为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音乐作品，一方面是作曲家把自己心里曾经体验过的情感通过美的音响符号形式对象化，是作曲家自我情感的一种表达，自我观照，自我对话；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表达又不仅仅是作曲家个人的，同时也是作曲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的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的情感表达，也就是说，音乐家的“小我”情感实质上是 he 所属时代和群体的“大我”情感的一种折射，因此，作为作曲家情感的对象化的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是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鸣的社会性情感。作曲家之所以成为作曲家是因为他能够把大家都感受到了的却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的感情用有意味的美的音响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作曲家成为大众社会性情感表达的代言人，而他的作品则成为大众社会性情感表达的符号中介，成为在社会中传递和传播感情的一种手段，它的直接作用就在于促进情感的社会化。音乐审美活动由此成为作曲家与社会大众情感交往和互动的过程，成为作曲家与社会大众主体间的精神交互过程，成为作曲家和社会大众主体间的精神对话。它是人通过美的音响符号的创造，并且以美的音响符号为中介而进行的一种心灵—精神的交往活动。在音乐活动中，审美主体因介入环节的不同与角色的差异，彼此间形成了不同的心灵—精神的对话方式。

参考文献：

- [1] 钱仁康. 柴可夫斯基主要作品选译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6: 2—3
- [2] 巴赫金. 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344
- [3] 周宪. 20世纪西方美学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40

【责任编辑: 王建平】

（上接第 63 页）

- [18]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June): 301—325
- [19] 李明辉. 独立董事的约束激励机制研究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3): 73—81
- [20] 李明辉. 独立董事的报酬机制研究 [J]. 证券市场导报, 2004(8): 23—27
- [21] 北京连城国际顾问有限公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2004 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排名及研究实证 [J]. 法人, 2004(9).

【责任编辑: 赵小华】

paper's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diversification could create value given developing economy

Key words: diversification, firm value, firm growth, financial environment

A Motiv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Diversification

(by LI Qiang, LIU Shanmi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diversification using the cross data of China's 1033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Exchange. Corporat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ubstituted by index of marketization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is substituted by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financial status. The multi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diversification is prominently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of index of marketization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 and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state shares and corporate shares.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director part-time general manager manager compensation, cash flow, and capital and liability ratio.

Key words: index of marketization,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 diversification,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he Transplant Effect of Chines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Complementarities

(by LI Minghui)

Abstrac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 such as the system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economy. So the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 transplanted system and loc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a state decides to transplan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The system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en many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 are not established. The lack of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 leads to the inefficienc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China to a great extent. The practice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progres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letely convergence of differ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Key words: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Musical Activity: A Particular Means of Huma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Beautiful Acoustic Signs

(by HUANG Hanyu)

Abstract: Musical activity is a particular means of feeling contact that accomplished by composer, performer and listener with pretty acoustic signs underwa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intermedia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music composing, it is the composer's own feeling cont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usic being played, it is the feeling contact between the player and the composer with the music text. During music appreciation, it is a dual contact interacted among the listener, the player and the composer by means of acoustic signs.

Key words: musical activity, acoustic sign, feeling contact, dialogue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Music

(by PU Hengji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music, a problem unsolved till now. The author intends to establish a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music: follow the sound, by freeing him self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routine way of thinking. He offers a really new proof for this new theory.

Key words: origin of music, body characteristic, environmental factor, driving force factor, follow the sound

Aesthetic Values of Christian Culture on Western Music

(by CHEN Junsheng)

Abstract: Christian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soil for Western music, and the very source of its artistic style. Christian culture and values have the following impacts on Western music: Firstly, Christian culture helps the Western music aesthetics tradition to integrate and pass down. Secondly, Christian culture extends enlightening value to the Western music creation concerning themes and topics. Thirdly, Christian culture helps to lay foundation for Western music's aesthetic images. Finally, Christian culture has valu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variety of Western music types. Without Christianity, the cre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modern Western music are unimaginable.

Key words: Christian culture, Western music, aesthetic values

Jinan Massacre and the KMD Nanking Government's European and American Diplomacy

(by HONG Lan)

Abstract: The KMD Nanking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the stabl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lations as its diplomatic policy. Even right after the "Jinan massacre" occurred, Chiang Kai-shek still hoped to solve the military conflict in private through negotiation. Because Japan intended to amplify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 KMD Nanking government turned to seek help from the West and detailed Wang Chonghui, Wu Chaoshu and Hu Hamin to Europe and America, striving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from big powers of Britain and the U.S.A. and France etc. Hereafter the KMD Nanking government's diplomatic pattern made a tremendous turn from Japan to Europe and America.

Key words: Jinan Massacre, the KMD Nanking government, diplomatic pattern